

一般说来,“历史”指历史事实,即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或者指历史文献,即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研究,又或指历史观,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无论如何,历史的对象是过去。近来兴起的“大历史”,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视野扩展至人类史之外,将人类史和自然史熔为一炉,讲述宏大的起源故事。但是,大历史仍然是过去的故事。

“当代”尚未过去,如何能有名副其实的“当代史”?不是说时间上的“上一秒”没有过去,当然可以把24小时以前的事件和活动作为“过去”来讲述。但是,只有一定时间间隔的历史事实,才适于作为历史学家反省的对象,因为历史学家试图从过去提炼智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想理解历史真相,考察对象最好与当下有足够时间间隔,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可能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惑,太远则可能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

德国美因茨约翰古登堡大学现代史教授安德烈亚斯·罗德撰写的《21.0:当代简史》一书,面临的问题是前一种。它不像一本历史书,更像是当代社会问题研究,可能“当代世界鸟瞰”之题名更切合它的内容。

即便换题,“当代”的时间起点选取,仍然颇费周章。罗德给出两个时间参考点: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性开始被质疑,二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被加速和不确定所支配。就一部“当代史”而言,两个时间点相差太远,而书中的讨论常常追溯到西欧、北美的工业革命时期。

这本书在时间轴上没有清晰的界定,根源在于罗德对于当代性没有仔细思考。当代性是否是与现代性相对的概念?如果当代性是当代性之后,现代性被质疑便是合理的起点。如果当代性是当代性的延续,视野便可以扩展至现代之初。

如果将当代史等同于当代世界概况,时间轴问题将不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解身处在其中的当下,而非从过去寻找某种智慧。本书正是如此写作,囊括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又没有放弃提炼某种宏大的历史观的野心。单从某个问题看,本书的讨论都是浅尝辄止。从整体看,它的讨论又显得有些零碎,相互之间缺乏明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当代世界

■刘永谋



作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太过明显,对于近东、远东和拉美缺乏必要关注,非洲、大洋洲基本上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因而显得缺乏某些理解当代世界足够的知识和常识。

《21.0:当代简史》, [德] 安德烈亚斯·罗德著, 朱颜译, 商务印书馆 2020年1月出版

显的关联。

然而正因此,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普通公众看的书。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历史观,加上散见各处的某些细节或智慧,已经足够非专业人士学习和吸收了。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在当代世界鸟瞰中,获得一星半点的心得,已经足够。何况该书包罗万象,大家能想到的“高光”问题都有涉及,引起读者兴趣的“点”肯定会有很多。

本书总体化理解并不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罗德全球视野明显有些狭窄。对此,他在“绪言”中已经承认。这本书更像是“一个德国人眼中的当代世界”,相当多内容是德国史,称为西欧美史亦可,但作为全球当代史,颇有些勉强。作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太过明显,对于近东、远东和拉美缺乏必要关注,

非洲、大洋洲基本上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因而显得缺乏某些理解当代世界足够的知识和常识。

譬如,罗德理解全球化有三波浪潮:第一次全球化发生于19世纪中叶之后,基本上是西欧与北美的“全球”交流;第二次全球化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支配世界的结果,终结于2008年金融危机;第三次全球化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基础上的深度全球化进程。

显然,罗德完全是站在西方立场看世界的。2008年金融危机重要到暂停全球化浪潮吗?这是德国人的感触,因为金融危机源头在美国,对西欧冲击巨大,而金融危机对东亚和中国的冲击没有那么火。并且,世界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中恢复过

来之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卷土重来,还是如特朗普所言:全球化已经终结?换言之,罗德对于全球化的未来是否太过于乐观?

因此,在读这本书时应该多一点反思,多从中国现实来理解当代世界。

二

当然,批判性阅读不能全盘否定。我认为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原因如下。

一是书中提到当代世界的加速现象。1860年就有人感慨:“现如今没有人能享受到清闲,人们总是在活动着,不管是在寻求快乐,还是忙于工作。”加速现象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技术加速发展,生活加速变化,以及越来越强烈的时间压迫感。一些理论家将加速视为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称之为加速主义。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以及近来备受关注的“过劳死”,都与加速主义信仰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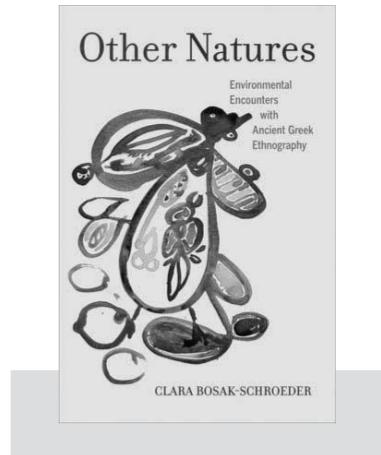
二是数字化的深刻内涵。在当代世界的阶梯式加速中,数字化已经成为提供加速度的重要推动力。反过来,世界加速又给人类社会进一步数字化的合理化提供支撑。在如此相互刺激之下,当代社会在加速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

数字化究竟是什么?罗德说,面对信息的汹涌而来,可不可以换个思考方式,或者干脆隔绝所有不必要的信息流。实际上,“数码联盟”起初是由书呆子和军队组成的,硅谷崛起之后就被信息技术与跨国公司的联合所取代。面对“数码联盟”的碾压性力量,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加以警惕。

最后是当代政治的媒体化。西方国家各种选举仍然如常举行,但公共舆论和辩论空间日益被大众传媒和公关专家所操纵。无论是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还是对未来改革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大众传媒所引导,从而帮助实现西方社会制度的稳定。如此民主还是民主吗?西方专业化的大众传媒遵循的是媒体逻辑,绝不是真相,关注的是短期炒作,而不是长远规划。于是,政治日益表演化,以上镜能力决胜负,依据媒体统计数据来决策。这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中,“假新闻”(fake news)一词走红,成为特朗普口头禅的原因。

总之,善于读书的人,必定会从历史的野地中采摘到精华,从万花筒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域外



2020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拿-香槟分校的古典学助理教授克拉拉·博萨克-施罗德的作品,《Other Natures: Environmental Encounters with Ancient Greek Ethnography》(本文作者译为“他者眼中的自然:与古希腊民族志的环境学相遇”)。

本书作者认为,古希腊的民族志著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由此可瞥见古人的环境思想、假定与忧虑,以及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联系。她重点考察了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的著作,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希腊之外的族群(如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之活动如何影响了当地的动物、植物、气候和景观,反过来,动物、植物、气候和景观也深刻地影响着本地族群。

作者的研究揭示出,这些古希腊学者是如何利用对非希腊族群的民族志考察来探究、质疑和挑战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的(即希腊人是怎么吃的、怎么繁衍的、怎么养育后代的、怎么合作的、怎么积累财富的、怎么消费的)。通过发扬光大这些重要的古代思想,使当代环境文学提出的议题与观念获得了新的启示。她认为,人类的生活与福祉同非人类世界的生活与福祉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回顾古代的民族志,我们可以梳理出应对环境危机的重要模式,重塑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

在本书“引言”中,作者写到,小时候,父母带她到加利福尼亚科学院去看展览。她最喜欢看表现异域人群生活的实景模型,其中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场景是:灌木丛中一个半裸的非洲女子手拿一个虫子放进张开的嘴。她被惊到了,想象自己也处在这样的场景中,半裸着,吃虫子。这对于她最终下决心研究环境正义是个里程碑事件。因为这让她看见了“他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甚至是在博物馆里看展览,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如何消费是相关的。

古希腊民族志里的环境文化

■武夷山

她问自己:如果别的地方的人吃虫子,我也该吃吗?如果别的地方的人在破屋子里也能生存,那我真的需要拥有那么多东西吗?

多年之后,博萨克—施罗德了解到,古希腊的学者也在以类似方式描述他者的生活,描述的载体就是记叙遥远的地方及其居民生活的“民族志”。例如,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写的《历史》中就记载着,巴比伦人将尸体置于充满蜂蜜的容器中下葬,他们的悲悼方式同埃及人相像。狄奥多罗斯在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丛书》中写到,多数希伯里人演奏齐特琴以赞颂阿波罗神。有趣的是,这两位历史学家和古希腊其他民族志作者在写作中都采用的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仿佛他们描述的风土人情是亘古不变的。作者表示,这些文字同她小时候看到的实景模型本质上是一回事。

这本书主要关注环境文化,即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自身、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书中探索了古希腊民族志所反映的环境文化,记叙了作者本人

与古希腊民族志写作方式的相遇、相知过程。作者强调,古希腊民族志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描述的环境文化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于当下,而在于这些著作所探讨的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紧密交缠对于当代人不假思索就紧抓不放的一些基本假定(我是谁、我应该怎样生活)提出了挑战。

她说,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环境史学者William Cronon曾说,“如果我们让自己相信,自然界若耍名副其实,就必须处于荒野状态,那么,人类在自然中立身就意味着自然的失落。人所在的地方就是自然退位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几乎没有希望去发现,人类在自然中的合乎伦理的、可持续的、体面的位置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她对此观点非常认同。

博萨克—施罗德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古典语言专业学士学位,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本书是她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下一步她打算研究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家是如何演绎表现古代世界的。

哲学家的晦涩

■韩连庆



《黑格尔传》, [法] 雅克·董特著, 李成季、邓刚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1月出版

“哲学家们知道,适度的晦涩既是思想表达的需要,也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著作都是晦涩的。如果你写得淡如白水,谁还会研究你?”

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去世,享年61岁,死因是流行性霍乱。

那年的欧洲流行霍乱。夏天的时候,黑格尔一家人离开柏林,跑到乡下避难,等到秋季学期开学时,才重新回到柏林。一个周日的

早晨,黑格尔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医生起初认为不是霍乱,后来病情加剧,几位医生会诊后,确诊为霍乱。三天之后,黑格尔病逝。

黑格尔的遗孀对他的死因表示怀疑。她曾对他的妹妹说:“你能从这些东西里面看到一丝霍乱的症状吗?”黑格尔死于“没有外部症状的”霍乱。法国电影《屋顶上的轻骑兵》就是以这场霍乱为背景,讲述了一个“霍乱时期的典雅爱情(courtly love)”的故事。电影中染上霍乱的症状是发高烧和呕吐。

黑格尔11岁的时候,他的家乡斯图加特肆虐瘟疫的袭击,死亡率很高,他的母亲就是死于一场痢疾。尽管黑格尔活下来了,但却一直受到痢疾后遗症的折磨。

黑格尔死后,当地的“霍乱管理委员会”封锁了黑格尔的住处,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了消毒。两天之后,黑格尔的葬礼在柏林举行。法国哲学家雅克·董特所写的《黑格尔传》以这场“不同寻常的葬礼”为开端描写黑格尔的一生。他说,黑格尔总是从反面去理解事物,所以如果理解了黑格尔的死,就能更清晰地理解他的生。

董特推测,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宣布为霍乱致死可以免除很多怀疑,尸体可以被迅速地处理掉,也可以防止事后的纠纷。“无论如何,黑格尔至死都始终保持着他的内在性格特征:矛盾和犹豫。”

读到这里,不禁吊起了我的胃口:难道黑格尔死于一场“阴谋”?我期待作者为此能提供一种解释,但又怕落入流俗的窠臼。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似乎忘了这个话题,直到进入黑格尔晚年的章节才又回应了这个话题,认为霍乱或许是黑格尔的“代用毒药”,使他避免了最糟糕的状况。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用“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来描写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也曾说“他出生,他写书,他死去”作为自己的简历,似乎哲学家们都是在思

考和写作中度过一生的。

可是,亚里士多德教导过亚历山大大帝,成了“帝王之师”;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后出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试图改革大学教育,他的“纳粹问题”至今还是个烫手的话题;齐泽克也曾参选过斯洛文尼亚的总统,别人想请他担任文化部长,而他却说自己想当秘密警察局的局长。哲学家从来都不是“首油的灯”。

死前的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的校长,声誉如日中天,当时的人尊称他为“哲学家先生”。不过他也开始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从表面上看,黑格尔是体制内统治权力的“同谋”。他赞成君主立宪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历史评论中,都被认为是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背叛,是开历史的倒车,是落后的封建思想的表现。

但是,黑格尔又经常和反对普鲁士政权的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当局几乎在每一个案件的卷宗中都能找到黑格尔的名字。在日常的教学中,黑格尔经常传授一些“秘密口授”的思想,被认为含有反宗教和反政府的倾向,遭到了检举。

黑格尔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教会和普鲁士政府的怀疑,他开始受到攻击和排挤。他的有些学生不像他那样谨小慎微,试图将思想付诸行动,可黑格尔又谴责他们的排外主义、排犹主义和盲目的暴力是“德国式的愚蠢”。其实马克思早就把这个问题看穿了,他曾说:“在黑格尔与宗教、政府等等之间,不可能和解的问题。”

在董特的这部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叫“入世”,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大背景出发,描写了一个在“思考”和“写书”之外积极入世的黑格尔。由于被认为宣扬无神论和支持各种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他与教会和普鲁士政权的冲突逐渐白热化。所以董特才认为,“在黑格尔临终之时,破裂的临界点似乎就要

来临了……人们通常认为他死得‘是时候’。”

理解了黑格尔的死,再来看他的“生”。黑格尔的哲学以晦涩著称,甚至被认为就是一些“字谜”。即使与他同时代的歌德也曾说过,黑格尔的精神如此杰出,但却很难表述自己。

晦涩是哲学的代名词,这是从康德开始的,就连黑格尔也指责康德的不可理解,可他又搞了一套比康德还晦涩的体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预言,由于社会发展和职业分工的需要,将来会出现“哲学家”的行业。这也是从康德开始的。

哲学成了一种职业,自然需要一些晦涩的“黑话术语”,以显得这是个专业的“圈子”。哲学家们顶嘴,适度的晦涩既是思想表达的需要,也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著作都是晦涩的。如果你写得淡如白水,谁还会研究你?

黑格尔年轻时写的读书笔记和日记还是很清楚的,可是一旦写作哲学就变得晦涩了。所以董特认为,黑格尔似乎是养成了晦涩的“天赋”,他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晦涩。

在黑格尔生活的年代,有专门的“拆信局”审查信件。他在与友人通信时,不得不用一些隐晦的语言和反话来讨论问题。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拥护当时的“长子继承制”,因为他要是不要这样说,这部著作根本无法出版。黑格尔既用晦涩来阐述他的思想,也用晦涩来规避各种风险和隐藏思想的锋芒。

董特认为,最大的晦涩乃是那些不明显的晦涩,也就是说,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那些我们自以为读“明白”的地方,才是真正“晦涩”的地方。黑格尔有句名言“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例如一个腐败的政府是“合理的”。他所说的“现实”指的是理念的实现,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实现了国家理念的政府才是合理的。



补一堂“神经美学”的课

■林凤生

上世纪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S.Zeki,一位热爱艺术的神经科学家,提出了神经美学的概念,开创了一个关于神经科学与美学的跨界研究的新学科,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的论文与著作也不断问世。

然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国内的学术界影响不大。一直到2018年10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马驰教授等学者发起、举行了国内第一次“神经美学”学术研讨会,30余位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的神经科学家、美术史家和其他学科(音乐、美学等)的专家汇聚一堂开展了讨论。在这个会上笔者有幸认识了周丰博士。他送给我两本他的翻译作品:《认知与视觉艺术》《艺术心理与有意识大脑的进化》。

两本书的作者罗伯特·索尔索在认知心理学领域是一位头脑敏捷的人物,他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创始人,编写的心理学教材被各个国家的大学广泛使用。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一套书是他为欧洲、美洲的多家大学开设“认知与视觉艺术”课程编著的,他在大学讲课时5年,对书的内容作了多次修改,所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由于神经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该学科的多位原创性工作的开拓者和研究者出版多种著作并发表了许多论文,但往往着眼于自己关注的课题,容易让不熟悉这一门学科的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新发现。最后确定《认知与视觉艺术》一书以讨论视觉为中心(眼睛—大脑—视觉认知—眼—透视—记忆—艺术认知),《艺术心理与有意识大脑的进化》一书则以“意识”为核心(艺术与意识—艺术与大脑—错觉艺术—艺术与模式)。

应该说,在主题安排上非常合理。作者有多年的讲课经历,因此这套书作为基础性读物已经非常成熟,在阐述原理时能够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例如,书中增加了不少示意图、表格和链接,有些插图构思非常巧妙,像介绍利用透视工具写实的案例,一般书都采用传统插图的视角,而他的插图转了一个90度,让我觉得豁然开朗之感。

另外,这套书旁征博引,对一些知识硬核作了很好的展开和铺垫,通过举例帮助读者理解,并能够有所体会和感悟。例如,由于视觉细胞的侧抑制现象产生的视错觉——马赫带,一般只留意它是在两种不同强度光照面的交界上的表达,书中则列举了许多科学与绘画——对应的例子:神经科学里的格栅现象——绘画里的“点彩派”,赫曼方格——绘画里的“光效应艺术”,甚至提到马赫带与宋代定窑瓷碗上的花纹的联系。

这两本书的翻译佳佳。周丰原来是学心理学的,也是一位诗人,后来硕士、博士专攻美学和艺术理论。我认为他是学文科的,文字好是理所当然。但他关于理科的内容翻译,我仔细阅读后发现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应该说,从内容到翻译,这两本书对于国内有兴趣关注神经美学的读者,不失为了解这个学科的佳作。